

思想論壇

《文化研究》第三十期（2020年春季）：69-82

迷失在認同焦慮中的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Lost in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王舒俐**

Shu-Li WANG

一座有歷史性的博物館，如何立足於當代？

一座博物館要面對與負責的群體是誰？是提供資金營運的贊助方？是文物的原歸屬社群？是參觀的觀眾？還是一般的社會大眾？

一座博物館是否應去政治化？又或，博物館是否有非政治化的可能呢？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的館長（Kaywin Feldman），2018年三月在牛津大學的演講時曾指出：在當代博物館面臨的諸多事務中，「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是最重要的議題（Van Broekhoven 2018）。的確，當代的博物館不僅要面對全球性文物返還的棘手議題，過去代表國家的博物館，其敘事要如何能含括與代表不同的社群、如何回應社會中多重的文化與群體認同？更重要的是，若當代社會對博物館的期望是一個積極主動的社會企業角色，這時博物館自身該如何彰顯其社會性呢？將「認同政治」的議題放在臺灣當代博物館所面臨的挑戰與轉型上，顯得格外重要。這不僅因為這是上述全球性博物館所面臨的新命題，更因為臺灣自身複雜的殖民經驗、難以理清自身歷史的窘境，

投稿日期：2020年1月08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1月31日。

* 本文感謝主編王智明先生的邀稿，以及黃桂瑩、謝長江與審查人對初稿提供的寶貴意見。

** 王舒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聯絡方式：shuliwang@gate.sinica.edu.tw。

還有長久以來臺灣社會內部對政治、文化、國族認同的混淆與爭辯，連帶使得文化政策與博物館運作都受到影響。最重要的是，二十一世紀的博物館功能與定位也從護衛文物為主的硬體館舍，轉向以人為主、在社會中扮演積極角色的非營利機構。因此博物館被期許要參與在地社群（community engagement），並成為實踐多元文化主義的包容性博物館（inclusive museum）。當代博物館功能與定位的轉變，可見於今年度ICOM世界博物館協會廣邀徵集博物館的新定義中，也呈現當代社會對於博物館較之以往不同的期許。¹

在這波國際博物館所面臨的社會挑戰與轉型浪潮中，臺灣博物館如何回應與如何定位自身呢？臺灣博物館的獨特現象，是博物館運作與政治的密切掛勾。在臺灣，博物館館長一職是行政任命，無論是直屬於總統府的故宮博物院，或其他隸屬於文化部、教育部的博物館。也因此每回政黨輪替，各大博物館的館長也替換一圈，使得博物館的發展方針，從歷史論述、收藏策略、研究方向、展覽內容到人事聘任等等，皆受到影響。首當其衝的是佇立於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作為臺灣第一大館，曾經肩負復興中華文化的擔子，在社會經歷民主化、本土化的過程中，其以中國史為研究重心的博物館定位，也在歷屆政黨輪替中逐漸鬆動。官方政策的搖擺，往往連帶影響了各博物館的規劃與實踐。如果藝術、文物、歷史詮釋與博物館的定位，皆難以跳脫當代政治的觀點，故宮博物院又該如何定位呢？

一、迷失在認同焦慮中的故宮博物院

2018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各種議題屢屢登上新聞與網路熱搜，從「故宮臺灣化」、故宮改名、故宮文物南遷、故宮北院閉館，到國寶赴日展覽

1 對於「博物館」是什麼？從十九世紀至今，學界有不同的定義。學界廣為接受的是1961年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定義：博物館為一永久性的組織、肩負典藏、展示、研究與教育的功用，之後數度擴展其內涵。2019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廣邀各界意見，草擬21世紀的博物館定義，最後幾個版本對於博物館的主要功能、博物館的社會性（是否該積極參與社會）等各會員國的意見分歧，最終無法定案。

等諸多新聞，不只政論節目上日日圍繞這些議題探討，也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議論話題。有人擔心故宮的臺灣化、在地化是否就是要切斷與中華文化的關係，有人關心國寶的運輸安全並質疑借展單位或地方性博物館層級不足以展覽「國寶」，有人擔心北院閉館整修乃政治操作、故宮會就此關閉，或故宮更名後就與其歷史意義脫鉤……從這些討論可以看出許多有趣的現象，過去有關故宮的議題大多僅在博物館學界發酵，不見得會在社會上引起討論，遑論此番的軒然大波。然而拋出這些議題之際，不僅正逢2018年地方縣市首長選舉，還有許多假新聞在各種媒體平臺中流竄，人云亦云的情況迫使故宮成立一個澄清假新聞的臉書頁面（崔至雲2018/09/11）。這些議論者對博物館學不一定有了解，也沒有深入去思考故宮的定位與運作，但他們卻輕易隨著媒體起舞，也因著臺灣特殊的族群及政治關係，使得議題的討論變得政治化。從故宮的國寶借展到國外，乃至於故宮的大小特展，似乎只要故宮做出任何改變就意味著去中國化與本土化的行為。

究竟故宮可不可以臺灣化呢？大眾需要恐懼故宮的去中國化嗎？大眾需要恐懼故宮博物院更名嗎？關於故宮博物院的諸多議題多見於新聞媒體與政治人物的口水戰，但較為可惜的是關於故宮博物院的定位、認同與轉型，卻甚少在學術界進行有組織的討論。人們究竟期待一座怎樣的博物館？它述說怎樣的歷史？在社會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我們希望在博物館學的專業上就一座專業的博物館應如何運作來進行討論。籌組這個論壇的目的，是希望從專業博物館學、文化政策、藝術史的角度，來思索故宮博物院的定位與認同、故宮南院的定位與發展策略、博物館的當代使命。在邀請撰稿者時，也特別邀請不同政治立場光譜的中生代學者，以平衡呈現不同立場的意見，以藉此回應社會大眾對臺北故宮相關議題的疑慮與討論。

二、當代博物館的兩種定位：從文化國家主義與文化國際主義談起

對於故宮博物院定位的分歧，或許可以參照國際間大型博物館對於自

身典藏文物的擁有與詮釋，主要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是採取「文化國家主義」的態度，視文物為一國所有；二是從「文化國際主義」的觀點，跳脫國族主義的框架，視文物為全人類共享的文化。所謂「文化國家主義」，顧名思義，即認為一個國家的文物屬於其所在地疆界範圍內的國家所有，為其國家主權的一部分。換句話說，文物、文化遺產不僅與一國的利益、價值和榮譽相關聯，也有助於界定自身文化及表述方式、並和其文化認同與社群認同緊密關聯。從博物館文物典藏的觀點來看，若將文物或文化遺產從一地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移除，將有損該文物的文化價值、亦將損害其所屬群體的文化認同。當代倡議文物返還（repatriation）的支持者，多是抱持此種觀點。在博物館學中不乏博物館與國家認同關連的討論，過去臺北故宮也力行此立場，因此，在這波批評故宮臺灣化的聲浪中，部分批評者認為故宮的主要典藏文物來自中國大陸，自應以研究與展示中華文物為主體，因此對於收藏臺灣文物、擴充亞洲文物有著不同的意見。不可否認臺灣對於國家認同的分歧，連帶也影響了博物館對自身的定位與運作。

另一個觀點是「文化國際主義」，視文物屬於全球人類共有，每個人都有興趣與責任護衛與欣賞文化遺產。採取此觀點的人跳脫國家主義的框架，相信全球主義與普世價值。一些國際博物館採取這樣的觀點，認為文物應該由具有較好資源與保護能力的國家護衛。他們認為若移除博物館對這些文物的所有權，將會有損並侵犯文物所在地對於捍衛全球知識與全球共享遺產的努力。當代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首而展開的「世界文化遺產」體制，就是基於這樣的信念，視文物／文化遺產為全人類共享的遺產，用普世性的標準將文物予以分類、建立標準體制，從而建構全球性的文化遺產體制。這個全球體制採取文化國際主義的立場，認為保衛文化遺產不僅是全人類共同的責任，同時每一個人都具有欣賞與親近這些文化遺產的權利。

無論是文化國家主義或文化國際主義都各有護衛者，也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批判。例如：採取文化國家主義者，會讓個人性／少數民族／弱勢群

體在「國家」整體概念下被壓抑。例如在墨西哥瓦哈卡地區的原住民博物館進行研究時，筆者發現該地國家菁英與原住民的高度對立和衝突，使得原住民群體往往反對文物放置在該國國家級博物館中。另一方面，採取文化國際主義者也應正視，全球性的遺產體制在歷時四十年間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修正，開始重視在地脈絡下的社群與文物、遺產的關聯。此外，對於國家與全球性的概念，也不是可以這樣簡單地二分。熟讀全球史的人會知道，國家疆界與概念會不斷地變遷與消長，這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這幾十年來曾經嘗試編撰全球史卻失敗的原因。²

這兩個觀點如何影響並左右當代博物館對於其文物的擁有與詮釋呢？歐美許多大型的博物館多採取「文化國際主義」來合理化其對於文物的擁有權與詮釋權。2002年，全球十八間著名的國際博物館共同簽署與發表「關於普世性博物館的價值及重要性的宣言」（The Document of Universal Museum），這個宣言強調一個偉大的博物館能提供能將文物放置於重要脈絡中的環境，使得博物館的文物與展覽能有跨文化比較的機會。同時也認為博物館應該將文物視為「藝術」作品，使得觀眾能欣賞文物的藝術價值與審美價值。這個宣言的誕生，合法化了這些大型博物館對非本國文物的擁有權。如果仔細分析這個文件會發現，宣言對於博物館文物的藝術（artistic）與審美（aesthetic）價值的著重程度更勝於文物的歷史與文化（historic, cultural）價值。這份宣言強調文物與展覽不應該被侷限於一地，而該放在一個更大的尺度與脈絡，使跨文化的比較得以實踐，從而助於理解人類文明的發展。雖然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並未簽署此份文件，但是當時的前館長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公開支持這個宣言，認為大英博物館是為全人類保存與護衛文明的機構。（有趣的是，這位英國籍藝術史學者／大英博物館的前館長被挖角到德國，主導德國柏林博物館島上幾座國家博物館的改造計畫。一國重要的國家級博物館由非本國籍人擔任館長，或多或少反映了國族認同在博物館中扮演的角色逐漸淡化。）

2 二戰後聯合國曾經多次組織項目邀請學者、企圖從聯合國的立場撰寫全球史，但冷戰時期就出現不同立場的學者與國家的觀點歧異，最終計畫失敗，仍未能出版。可進一步參考Betts (2015)。

然而，這樣的兩種不同的文物歸屬觀點，放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因其複雜的文物遷徙（從中國大陸到臺灣）、文物所有權（中華民國 v.s. 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博物院在臺北成立的歷史背景、還有當代臺灣人民理還亂也說不清的政治認同，自不同於國際間關於文物返還議題的討論，似乎也難以單在「文化國際主義」與「文化國家主義」間，定位故宮的方向與其文物的屬性。

筆者長期在中國大陸進行博物館的相關研究，在此分享在該地觀察到的現象作為對照。佇立在北京天安門前，作為中國大陸門面首屈一指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其展覽也不侷限於中國的歷史時期，不僅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疆界內從中華文明史前時期、青銅時代開始到明清瓷器書畫的展示，還有一個展廳是中國近現代到當代的陳列與介紹。此外，還有非洲文物展以及大大小小來自國外的特展。筆者在田野研究地的幾座博物館中，也觀察到其展覽不只是以該區域的考古文化和文物為主體展示，博物館陳設也開始將其區域內的考古文明與同一時期的其他文明之文化發展進行對比，同時還有當時陸上絲路與海上絲路的文化交流，如何使得器物原料與技術發展因為文化交流而進步。該地的省級博物館與市級博物館也用大小不同的特展，將該省與該市置放在跳脫中國史外更大的區域，透過跨文化比較和文明交流來重新詮釋歷史。新的展覽詮釋，使得這些在地的文物與區域史、世界史並置作文化間的對比。此外，近年來全球各地出現了一些跳脫國家範疇、以區域為主題的博物館，例如在新加坡有亞洲文明博物館，敘述東南亞地區的族群與文化交融。歐洲最近也出現幾座跳脫國家範疇的博物館，例如法國馬賽的歐洲地中海文明博物館，它以地中海文明作為主軸，跨越當代國家的範疇，展示地中海概念從史前至當代的歷史與文化。

中國大陸博物館出現的新變化，或許也能讓臺灣重新反思博物館與國家認同的關聯，進一步反思故宮的中國史詮釋，是否應該將故宮放在比族群（漢人文化）、國家（中國史）更廣闊的區域史（東亞，或者亞洲）、甚至是全球史的範疇中來探討，呈現東、西文化的交流、互動，乃至於對照。

許多文化批評者深感焦慮，並認為故宮若是不再以研究、典藏和展示中華文化為主體，是否就有去中國化的疑慮呢？筆者認為大家無須憂心，故宮博物院自成立以來，一路從北京遷徙到臺北的歷史淵源以及其典藏文物的性質都使之無法跳脫原有的歷史脈絡，也皆與華夏文化息息相關，即使後續擴充臺灣或東南亞藏品，也難以撼動中華文化作為故宮主體的基調。因此，故宮博物院難以真正地去中國化（參見本論壇許雅惠的文章）。故宮南院的誕生，使故宮跳脫原有的「中國史」定位，並將之投入在東亞史和亞洲區域史更大的範疇之中（參見本論壇施靜菲、黃舒楣的文章）。雖不可否認認同政治在故宮的轉型與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似乎也符合當代博物館發展的趨勢。

三、從電玩展、鄭問展，到博物館的文物外借的風波

從國際博物館這幾年來的發展趨勢，我們也可以看到歐美大型的博物館近年來的展示顯得活潑，不再只為菁英藝術服務，觀眾也不再只有中產知識分子。這幾年臺北故宮開始籌組新型態的展覽，如「鄭問—故宮大展」。此展雖然人氣頗高但卻飽受不少藝術界的攻擊，批評者認為故宮是「高藝術」的殿堂，怎能展示「次文化」呢？例如典藏雜誌社社長簡秀枝便質問為什麼鄭問可以進入故宮？為什麼漫畫可以在故宮展覽？然而，筆者觀察這幾年的歐美大型博物館，也陸續開始有許多流行文化的元素進入。例如日本動漫主題的特展大為流行，在大英博物館從浮世繪到當代動漫都有展出，就是因為關注到動漫在青少年世代的流行，漫畫作為當代藝術的價值也逐漸被重視。筆者2019年參訪荷蘭國立熱帶博物館的日本動漫展，發現這是展廳中人最多的地方，參觀民眾也不限於青少年。展區間許多互動的電動遊戲機制、動漫電影、動漫書籍來呈現日本動漫的世界。這不僅呈現了博物館在當代多元主義的思潮下試圖擁抱與拉攏不同的群體，特別是從過去博物館的參觀主體如知識分子或中產階級，朝向新移民、青少年與老齡人口發展，也呈現後現代主義的觀點下對藝術史的反思，開始

解構所謂「藝術」的概念，打破「高藝術」和「普羅藝術」的階級對立。過去被視為普羅藝術、次文化、流行文化也具有其藝術價值，也應當有機會進到博物館的脈絡，使不同的年齡層、族群、性別都有親近並參與文化的權利，這不僅與國際潮流相符合，也呼應這幾年臺灣開始強調文化平權的文化政策。

其他爭議還有國寶出借，如故宮向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借顏真卿《祭姪文稿》所引起的軒然大波。當時有些批評者從文物保存的角度提出質疑，如紙質文物脆弱易損，赴外展出有損壞及調包的危險性。批評者同時也針對當時（2018年）預計出借到澳洲新南威爾斯藝術博物館與日本東京文化村、靜岡市美術館及福島縣立美術館的文物，認為展出地點非「國家級」博物館而僅是縣立博物館，故宮出借展品是自貶身價、降格以求。也有人認為日方展示「國寶」的單位與層級不足，不夠格展覽來自故宮的重量級中華文物。然而文化本無高低之分、藝術無雅俗之分，更何況地方的層級與差距也是一種當代的建構，因此不應再以「精品」此種自視甚高的論調來形容故宮的文物。筆者認為藝術應該開放給大眾，同時藝術並無高貴低俗的等級之分。若批評者是以借展方的保全系統和展覽設備來質疑故宮文物在外展覽過程中可能會受到破壞，此種立論還稍站得住腳。試問，羅浮宮的「鎮館之寶」蒙娜麗莎不輕易外借，其原因多是認為紙質文物在運送過程中容易損壞、借展方的保全可能不夠完善以及沒有公司能承受此文物出借展覽的高額保險費，但甚少會有人質疑邀請借展的展示單位，其地位與規格不夠與羅浮宮媲美。臺北故宮文物外借時，首先應思考藏品的保存與安全性，也因此珍稀、易受損的藏品多半不外借，而不是去考量借展方的「地位」是否符合。

四、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定位與認同

上述國際博物館的一些新趨勢，似乎可以解釋臺北故宮這幾年的銳變與嘗試。在臺灣，由於博物館館長皆為官派，使得博物館的經營難以完全

跳脫政治色彩。臺灣博物館的運作會因應政治意識形態更替而改變，大概是世界上少有的現象，也可作為博物館學史研究上的經典（Vicker 2008; Wang 2019）。眾所周知，1965年在臺北外雙溪成立的故宮博物院，肩負著復興中華文化的大任，這一時期的故宮以經典中華文物的研究與典藏著名，透過創立學術刊物《故宮文物月刊》、舉辦國際研討會和展覽來強化其作為守衛中華文化的中心的地位（參見本論壇許雅惠的文章）。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由歷史學者杜正勝接任院長（2000-2004年），替換接掌故宮17年的秦孝儀院長。杜正勝的兩項創舉呈現出他的意識形態，並將故宮本土化和去中國化。第一個是利用故宮的特展對外展示反轉、橫向的臺灣地圖，其用意是跳脫過去從中國看臺灣的歷史觀點，使臺灣在地理空間上不再依附於中國大陸周邊，而是以臺灣為中心，擴展到東南亞／東亞；第二是提出故宮分館和南院的概念，跳脫故宮以中國史為主體的研究與展示方向，擴展到東南亞／東亞。其後的館長石守謙（2004-2006年）、林曼麗（2006-2008年）、周功鑫（2008-2012年）、馮明珠（2012-2016年）、林正儀（2016-2018年），開始關注博物館的管理與營運重整，不僅致力於包裝與行銷故宮、拍電影、開發文創商品，並開始有大故宮計畫，這些舉措都反映了當代博物館關注遊客經驗與致力於行銷觀光的潮流（關於故宮科技媒體與策展的運用與評論，參見本論壇曾柏文的文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政府時期，致力於兩岸交流。周功鑫與馮明珠任院長時，臺北故宮的院長應邀到北京故宮訪問開啓了兩岸故宮與博物館的交流，此時期臺北積極與中國大陸的一些單位合辦特展，邀請中國大陸的博物館文物借展到臺灣（雖然礙於政治因素臺北故宮的文物不曾借展到大陸），最著名的當數2011年的特展「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原本典藏在浙江省博物館的《剩山圖》與臺北故宮的《無用師卷》合作展出，使得分散兩岸的《富春山居圖》數百年後合璧展出，也頗有政治上的隱喻。

蔡政府時期聘用擅長營銷的林正儀擔任院長（2016-2018年），但也招來博物館只重行銷而忽略研究工作的非議。不過在當代自由市場運作下的各大博物館似乎都不能只閉門做研究，而不去經營觀眾。其後，蔡政府

聘任人類學家陳其南擔任院長（2018-2019年），他所推出的展覽（在林時代已經開始籌畫）2018臺灣燈會「故宮新媒體藝術展」、「千年一問——鄭問故宮大展」皆以臺灣作為主軸。其任內舉辦「國寶再現——書畫菁華特展」，凸顯清宮舊藏的文物作為臺灣的國寶，以此建構出臺灣與故宮之間的聯繫。值得一提的是，陳其南認為應該將文物作為獨立作品來看待，引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概念來欣賞文學作品。陳其南在面對媒體時曾提到：「博物館展示文物的意義在於讓觀眾透過凝視對文物進行解碼，進而賦予文物嶄新的文化意涵。過程中形塑其人格以及對社會、民主共同體的看法」，「我們在替我們的後代、替我們的全世界去保留這個世界的古文明」（ARTouch編輯部2018/07/17）。在其任內最後一個特展「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中，跳脫清朝統治臺灣的框架，回到十七世紀的東亞世界，圍繞著荷蘭、日本、明帝國、荷屬臺灣來呈現東、西方的文化交流與互相影響，以此說明他心中對於南院故宮作為亞洲博物館的想像藍圖。

近期剛上任的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2019-?年），是著名的臺灣史、獨派學者，不同於過去館長中大多以中國藝術為專長，吳卻有著多年的博物館管理經驗，因此在他上任後致力於博物館「友善化」，提升遊客的參觀經驗與建立博物館策展策略。他的理想是將故宮發展為世界博物館，而不只侷限於中國美術史的介紹。2019年四月，筆者在一次與吳院長的私下交流中，他曾提到故宮博物院不應僅侷限於中國美術的研究，若故宮要發展成世界級的博物館，它還需要涵蓋不同地理空間的文物與人才，並將其賦予新的意義。無論是故宮本館或南院的文物，要將其置放在世界史的範疇之中，而不僅侷限在中國史的脈絡之下。此想法正好呼應了當代史學研究中全球史與區域史的大潮流，³而這不也正是中國大陸博物館今日的發展方向嗎？這裡可以看到陳其南與吳密察兩位院長的博物館論述，將故宮的定位從文物國家主義導向文物國際主義，讓臺北故宮原本以大中華文化為國家主義的認同範疇，轉向到視故宮珍藏為全人類共享的文明與文化遺

3 可參考蔣竹山（2012a, 2012b）關於全球史的討論。

產，也呼應世界各大有著不少殖民文物的歐美博物館，以世界史的範疇來思考博物館文物。雖不可否認將故宮定位在東亞史或世界史的範疇可能受到幾位院長政治認同的影響，但也不悖離當代國際博物館，乃至史學史致力於文明對比的發展方向。

五、代結語：博物館能不能去政治化？

本文認為「將博物館去政治化」是一種傳統博物館學的理論，因為博物館不可能自外於政治論述，也無法脫離歷史／政治／策展者的主觀論述，單就藝術而談論藝術。在這裡我想把政治這個詞彙作廣義的理解——視為公共事務，而非侷限在臺灣兩黨政治的狹隘爭辯中。當策展人選擇就藝術作品而觀賞藝術作品時，當他賦予文物意義與歷史脈絡時，這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論述。更有甚者，當代大型博物館皆開始思考自身在社會中的位置，邁向非營利組織與社會性的角色，更進一步對於社會、環境、人權、永續等議題提出思考與回應。這都是一座博物館可以積極扮演的角色。

臺灣的博物館是否受政治化影響？這答案顯然是肯定的。歷屆政黨輪替後的臺北故宮，從杜正勝的「把臺灣地圖換個方向看」以及提出故宮南院的構想，到陳其南提出將文物作為藝術品自身來觀賞，企圖淡化文化與歷史脈絡之於文物賞析的重要性，再到吳密察企圖為故宮擴編西洋藝術史的專才，使之成為世界級的博物館，以及與在地連結的「友善化」政策，這些舉措都在翻轉故宮過去以中國與中國藝術為研究與展覽核心的博物館方向。故宮南院的設立，更是擴充故宮從中國藝術展示的重心到更大的區域範疇，無論是東亞、東南亞研究，還是十七世紀的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點，同時，也因為地處嘉義太保，肩負著振興地方經濟的角色（參見本論壇黃舒楣的文章）。此外這幾年也開始出現一系列有關臺灣文化、次文化、臺灣原住民等關聯臺灣在地脈絡的特展。從大方向看，許多新設立的博物館打破國家疆界，而是以世界文明、區域史為主體，在更大尺度上與參觀者的對話，還有如德國國家級博物館聘任非本國籍專家擔任館長、以

及中國大陸博物館在當代納入世界文化的比較觀點，皆呈現當代國際博物館中國家主義的論述削弱，似乎與政黨輪替後臺北故宮的發展方向相符，也因此本文認為質疑者無需太過慌張故宮近幾年來的變化，固守傳統的運作只會讓故宮與當代國際博物館脫節。然而，本文也認為臺灣的博物館太過受到政黨政治與媒體民粹的影響，不僅使得博物館主事者更替頻繁、博物館也難有一長久性的發展方針，若是故宮的主事者囿限在去中國化、或者中國化的範疇中，使得博物館政策搖擺不定，讓展品收藏、研究方向、展示論述乃至於博物館中戰戰兢兢的從業者們無所適從，也就難以讓博物館回歸博物館學專業（參見本論壇施靜菲的文章）。即便如此，臺灣的博物館能否不受政治化的影響？如何跳脫狹隘的政黨在政治認同上的搖擺與撲朔迷離，帶領博物館往專業的方向發展，就有賴故宮現任與後繼之館長們的智慧了。

前文提到當代博物館開始強調其社會性，除了面對政治與社會的多元身份認同、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還有在文化議題上面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挑戰，這使得各國政府紛紛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概念融入文化政策中，史羅斯比（David Throsby）便指出全球文化政策的轉向，在當代呈現出重視地域、社區價值以及文化本土性（2010）。然而，當博物館轉向為擁抱社會群體的同時，往往混淆了「在地社群」（community）以及「博物館消費者／參觀者」（consumers）。當文化政策以社會性的公共政策為主導模式時，就會強調社群的文化權；當文化政策受到新自由主義、文化消費市場所影響，重視的則是市場價值。當博物館面對人群時，應理解一般社會大眾要的是參與權；而消費者重視的是消費權。可惜的是，當代故宮博物院在迎合年輕群體、發展文創產業與為更多的觀眾服務時，可能更著重的是後者，即博物館的消費群體，反倒忽略了博物館可以更具有社會性並積極地擁抱社群。即使大英博物館認為它們是在為全人類護衛文化遺產，參觀者來自全世界，其典藏文物更多源自世界各地，那麼在此背景下大英博物館又要不要在地化呢？英國化呢？答案顯然是肯定的。近來新博物館學講求社群參與，對於社群的定義，因不同博物館而異。博物館所面對的社群包括參觀觀眾，還有其所擁有文物的原生社群以及博物館所

在的社會群體。博物館必須與其所屬地的地方社群建立連結，不能自外於其所處的地方，這也是大英博物館近幾年來致力於在地化並與地方社群融合的理由。博物館不僅免費對外開放，其進行中的計畫「社群互助，社區作夥」（“Community Cooperation, Community Partnerships”），提供社區居民預看展覽、透過多樣的教育活動、互動課程來與社區及中小學合作，也和大學合作提供成人課程。因此其參觀者不只是慕名而來的觀光客，更有為數不少的本地人每年重複參觀。

臺灣的博物館該如何回應全球與當代社會的變遷呢？如何使博物館的社會性與社會價值能被彰顯，同時將人權、族群、弱勢和環境等議題主動納入博物館的論述中，鼓勵多元對話與參與，這都將會是臺灣第一大館——故宮博物院以及當代臺灣博物館亟應思考的問題。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ARTouch編輯部（ARTouch Editorial Board）。2018/07/17。〈「台灣化故宮」怎麼做？新任院長陳其南的一堂亞洲文化課〉“Taiwan hua gugong' zenme zuo? xinren yuanzhang Chen Qi-nan de yitang yazhou wenhuake” [What does “Taiw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do? An Asian Culture Class by the New Dean Chen Chih-Nan]，〈典藏新聞〉*Dianzang Xinwen* [ARTouch]。Retrieved from: <https://artouch.com/news/content-4997.html> on Sep 20, 2019.

崔至雲（Cui, Chi-Yun）。2018/09/11。〈故宮2000件文物與日本交換50年？故宮：絕無此事〉“Gugong 2000 jian wenwu yu riben jiaohuan 50 nian? gugong: juewucishi” [2,000 cultural relic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ill exchange with Japan for 50 year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No such thing]，〈ETtoday新聞雲〉*Xinwen yun* [ETtoday]。Retrieved fro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0911/1256138.htm> on Sep 20, 2019.

蔣竹山（Chiang, Chu-Shan）。2012a。〈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試論晚近西方史學研究中的「全球轉向」〉“Chaoyue minzu guojia de lishi shuxie: shilun wanjin xifang shixue yanjiu zhong de ‘quanqiu zhuanxiang’” [Beyond The Nation-State: On Global History and the “Global Turn”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新史學》*Xin shi xue* [*New History*] 23(3): 119-228。

蔣竹山 (Chiang, Chu-Shan)。2012b。《當代史學研究的趨勢、方法與實踐：從新文化史到全球史》*Dangdai shixue yanjiu de qushi, fangfa yu shijian : cong xin wenhuashi dao quanqiushi* [*Trends,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From New Cultural History to Global History*]。臺北 (Taipei)：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WU-NAN Culture Enterprise)。

二、外文書目

Betts, Paul. 2015. "Humanity's new heritage: UNESCO and the re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228: 249-285.

Throsby, David. 2010.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policy*.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Broekhoven, Laura N. K. 2018. "Calibrating Relevance at the Pitt Rivers Museum," in *Dethroning Historical Reputations: Universities, Museums and the Commemoration of Benefactors*, edited by Jill Pellew and Lawrence Goldman, pp. 65-79. London: School of Advanced Study, 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ickers, Edward. 2008. "Rewriting Museums in Taiwan," in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edited by Fang-Long Shih, Stuart Thompson and Paul- François Tremlett, pp. 69-101. London: Routledge.

Wang, Sui-Li. 2019. "Museums, Heritage and the Politics of Pursuing Indigenous Rights in Taiwan,"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8(4): 474-484.